

為新中國奮鬥

宋慶齡著

為新中國奮鬥

周長榮題

書號：1020

爲新中國奮鬥

著 者：宋 慶 齡

出版者：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發行者：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新華印刷廠上海廠

(滬)1-30,000
定價 18,000 元

一九五二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二年十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關於本書各部分歷史背景的說明

第一部

本部包括作品十一篇，是作者在一九二七年國民黨背叛革命後爲斥責這個背叛而寫的。除一九三一年的一篇外，其餘都作於一九二七年七月至九月。

在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曾經經過一次改組而變成人民革命的聯盟。這個改組是在孫中山先生親自指導下進行的。在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影響下，孫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建議，改變了他在一九一一年以來的革命路線，確定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革命綱領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並於一九二四年改組他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黨爲代表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聯盟的羣衆性的政黨。由於有了這些改革，國民黨重新獲得了生命力，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與中國共產黨共同舉行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消滅了長江以南的軍閥勢力，造成了全國的革命高潮。但是，正在這時候，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右派分子，公開背叛孫中山先

生的革命原則和政策，投降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從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上海事變開始，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和革命人民發動了大規模的兇惡的襲擊和血腥的屠殺。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武漢的國民黨跟着實行了同樣的叛變。從此，正如毛澤東主席在「論聯合政府」一書中所說：「內戰代替了團結，獨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國代替了光明的中國。」

在武漢的國民黨公開叛變的前夕，作者發表了「爲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一文，以嚴正的言詞斥責了孫中山先生的叛徒。她抱着對於革命的堅定的信念，宣佈與叛徒們分裂，並於一九二七年八月訪問孫中山先生所信賴的偉大的革命友人——蘇聯。在訪問蘇聯以前，作者發表了「赴莫斯科前的聲明」；在訪問蘇聯期間，又繼續發表了「向蘇聯婦女致敬」、「寫給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年青一代』」、「在莫斯科發表的聲明」、「對塔斯社發表的聲明」、「對列寧格勒『真理報』發表的聲明」、「婦女與革命」、「青年與革命」等一系列的聲明和論文，表示她對於三大政策的不變的忠誠。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事變以後，作者在上海發表「國民黨已不再是一個政治力量」一文，對於蔣介石國民黨政權的本質以及這個政權在民族危亡之際所進行的各種無恥活動，作了無情的揭露。作者在這裏表示她的確信：革命必將朝着正確的方向前進並獲得最後的勝利。

第二部

本部包括作品四篇，都是爲反對法西斯恐怖統治和保障人民權利而作的。

一九二七年以後，蔣介石反動政權一方面進行大規模的反共內戰，一方面在全國各地城市和農村中兇惡地殘殺革命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它的口號是：「寧可錯殺一百，不許放走一人。」蔣介石全力效法意大利的法西斯和德國的納粹，爲了鞏固他的反動統治，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成立了後來稱爲「中統局」的特務機關，在一九三二年三月成立了後來稱爲「軍統局」的特務機關。這兩個特務機關集中了大量的漢奸、流氓、土匪、兵痞和叛徒，毫無顧忌地剝奪人民的一切自由權利。人民的愛國民主運動受到嚴厲的鎮壓。據當時上海的一家報紙報道，僅一九三〇年八月至十月三個月中即有十四萬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橫遭殺害。

作者在這個黑暗的時期把保衛人民權利和營救被捕革命者的鬥爭作爲自己的主要任務。她和魯迅、楊銓等在一九三二年發起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不但直接援助了許多在蔣介石獄中的革命者，使他們得到辯護或釋放，而且對蔣介石的反動恐怖統治作了嚴厲的抨擊。作者在這一期所發表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任務」、「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會上對新聞界發表的談話」、「告中國人民」的聲明和論文中，暴露了蔣介石特務機關任意蹂躪人權、屠殺革命人民的殘暴罪行，

指出了保護被捕革命者的重要意義。在「譴責對德國進步人士與猶太人民的迫害」一文中，作者代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對希特勒匪徒在德國的恐怖統治提出了抗議。

第三部

本部包括作品八篇，代表作者對於一九三一年中國被日本侵入後的政治局勢的意見和作者在這種局勢中所作的促進中國人民一致抗日的努力。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蔣介石政府堅持反共反人民的內戰，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動繼續採取不抵抗政策，於一九三三年以後放棄熱河，承認日寇所提出的「華北特殊化」的無理要求，造成了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中國共產黨在九一八事變當時，首先號召抵抗日本侵略者。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國工農紅軍宣佈願與全國軍隊在抗日民主基礎上實行停戰。但是蔣介石對於中國工農紅軍和中國革命人民的進攻反而更加殘酷了。

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和蔣介石政府的賣國政策引起了全國人民的反對和國民黨內部的分裂。人民羣衆的愛國民主運動在全國範圍高漲起來。一九三二年一月，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所領導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違反蔣介石的命令，對進攻上海的日本侵略軍進行了英勇的反抗。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軍在被迫調到福建以後，這個軍隊的領導者與李濟深等即在福建成立反蔣的人民政

府，並與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工農紅軍簽訂停戰協定，宣佈共同抵抗日本侵略。一九三三年五月，馮玉祥、方振武等在察哈爾與共產黨人共同組織了民衆抗日同盟軍，發動了察北抗日戰爭。中國人民的團結抗日的要求到一九三五年達到了高峯。這是因爲日本在這一年對華北開始了新的威脅，而中國共產黨則正式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主張。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運動以後，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不顧蔣介石政府的殘暴壓迫展開了廣泛的救亡運動。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的影響下，張學良所部東北軍和楊虎城所部西北軍發動西安事變，逮捕了蔣介石，迫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實行抗日的要求。

作者在這一時期中，進行了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和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鬥爭，並領導了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遠東會議上海籌備委員會的活動。在「中國的工人們，團結起來！」一文中，作者指出：「蔣介石政府不能統一中國，不能領導武裝人民進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戰爭，不能給農民土地。」只有工人、農民、學生和義勇軍聯合起來，才能使中國獲得解放。「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是作者以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遠東會議上海籌備委員會主席名義發表的聲明，「中國的自由與反戰鬥爭」是作者在這個會議上所發表的演詞，她斥責了帝國主義的戰爭陰謀，闡明了人民的解放戰爭的進步性，認爲「反動的武力只能以革命的武力來對抗」。中國人民的武裝力量雖弱，但「武裝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思想意識也有其作用的。」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必能獲得勝利。在「爲楊銓被害而發表的聲明」和「爲『七君子』被捕而發表的聲明」中，作者對於蔣介石特務機關破壞

人民權利的罪惡行爲作了有力的指責。一九三七年二月，作者與馮玉祥、何香凝在國民黨三中全會上提出了恢復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建議，「實行孫中山的遺囑」一文即係作者在這次會議上的發言。在「儒教與現代中國」一文中，作者批評了蔣介石的反動復古思想，主張以改善人民生活的運動來代替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在「中國是不可征服的」一文中，作者要求國民黨與一切抗日力量相團結，指出日本的經濟及社會結構不能支持一個對中國人民的長期戰爭，認爲「中國太弱，抵抗不了日本」的意見是不正確的。

第四部

本部包括作品十二篇，除末了兩篇外，其餘十篇都發表於抗日戰爭期間。

在抗日戰爭中，國民黨反動派實行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反人民的罪惡政策。蔣介石用大量的軍隊封鎖陝甘寧邊區和其他解放區，屢次向八路軍和新四軍（他們是由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的，也就是現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進攻，而在國民黨統治區則壓迫愛國民主運動，剝奪人民的一切自由權利。

因此，解放區戰場就成了抗日戰爭的主要戰場。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侵華日軍用於解放區戰場的爲百分之六十四，用於國民黨戰場的爲百分之三十六。由於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的艱苦努力，由於全國人民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

倒退的鬥爭，由於以蘇聯為主體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援助，抗日戰爭終於獲得了最後的勝利。

作者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積極支持者和宣傳者。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發表的「關於國共合作的聲明」中，她說明了她的積極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立場。在「致英國工黨來華調查日本侵略的代表團的信」中，她指出了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所進行的侵略戰爭對於資本主義國家首先是英國的威脅。在「兩個『十月』」一文中，她表示了在抗日戰爭中建立起一個新的民主國家的希望。

一九三八年六月，作者發起組織保衛中國同盟（一九四二年以後改名為中國福利基金會，一九五〇年又改名為中國福利會），致力於戰時醫藥工作和兒童保育工作。她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四年所發表的論文和通訊「關於援助游擊隊戰士的呼籲」、「當中國贏得勝利的時候」、「中國需要更多的民主」、「中國婦女爭取自由的鬥爭」、「給中國在海外的朋友們的公開信」和「致美國工人們」，描述了中國抗日戰爭的真實狀況，說明了中國人民的意志，並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破壞團結抗戰的陰謀。這些論文和通訊對作者所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的工作起了推動的作用。有很多國際友人經過保衛中國同盟以醫藥用品支援在敵後艱苦堅持戰鬥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有很多國際友人組織醫療隊，由保衛中國同盟介紹到八路軍和新四軍所創造的抗日根據地參加戰時救護工作。白求恩大夫所建立的國際和平醫院就是這些醫療隊工作之一。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後，蔣介石在新的侵略者美帝國主義援助下繼續從事反共反人民的內戰。作者於一九四六年發表「關於促成組織聯合政府並呼籲美國人民制止他們的政府在軍事上援助

國民黨的聲明」，表示了對於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反共陰謀的態度。在一九四八年「給世界民主青年聯盟的信」中，作者發出了反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號召，表示了對於保衛世界和平的信念。

第五部

本部包括作品二十八篇，都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發表的。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全國人民支持下，最後消滅了蔣介石國民黨的罪惡統治。

一九四九年九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舉行了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們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會議上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並產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從此建立了中國的人民民主政權，開始了中國人民的偉大的歷史時期。

作者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被選爲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後，領導全國人民進行了經濟和文化的偉大的改革和建設工作，普遍地實行了土地改革，鎮壓了反革命分子的活動。孫中山先生所理想的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的新中國終於在他逝世二十六年以後成爲事實。久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奴役的中國人民第一次展望着祖國的無限光明的前途。

一九五〇年六月，美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戰爭。這個戰爭對於中國邊疆和世界和平形成嚴重的威脅。中國人民發起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組織了志願軍援助朝鮮作戰。中國人民的這種正義行動，沉重地打擊了美國侵略者，並為世界和平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由於作者在長時期以來對於保衛世界和平事業的貢獻，她在一九五一年榮獲「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

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這一時期中，作者不僅參加政府工作，從事新的人民福利事業和保衛和平運動，而且訪問了新中國的許多城市和農村。她所發表的作品也以這一時期為最多。她寫出了對於新中國的熱烈的頌歌：「向中國共產黨致敬」、「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講話」、「在中國人民救濟代表會議上的閉幕詞」、「解放鬥爭中的中國兒童」、「新上海的誕生」、「新中國的第一年」、「新中國的信息」、「新中國向前邁進」、「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鼓舞力量」和「偉大的中國三大運動」。在其他的作品中，作者集中注意於保衛世界和平的正義事業。這些作品包括「加強和鞏固中蘇友誼，粉碎戰爭販子的陰謀」、「在中蘇友好協會總會成立大會上的開幕詞」、「慶祝十月革命三十二週年向斯大林致敬電」、「在亞洲婦女代表會議上的講話」、「慶賀斯大林大元帥七十壽辰」、「蘇美外交政策的區別」、「中國人民簽名擁護世界和平」、「友誼就是團結」、「朝鮮人民的鬥爭在亞洲所起的作用」、「三十三年的進步」、「為榮獲斯大林和平獎金而發表的談話」、「論印中友好協會的成立」、「論和平共處」、「與『紅色權力報』記者的談話」、「印中友好協會帕芝辣分會成立賀

詞」、「在『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授獎典禮上的答詞」、「福利事業與世界和平」和「爲亞洲、太平洋區域和全世界的和平而奮鬥」。

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二年九月

序言

中國革命是一個長期的、艱苦的和複雜的鬥爭，爲了這個鬥爭而犧牲的是很多很多。它錯綜在全體人民的生活之內，交織在祖國的大地上。

中國革命的勝利是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與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爭取民族獨立和世界安全的鬥爭中，它們曾共同創造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它們也共同規劃了未來的世界，到那時候人剝削人的思想將成爲歷史的記載，而原子彈也將與棒槌和土砲同樣地變成博物館的陳列品。

從很多方面來說，中國革命是有它的獨特性的。因此，關於它的事蹟寫得越多，從它的經驗中所能獲得的好處也越多。陳毅將軍和另外幾位朋友都勸我說，如果我能把我從一九二七年以來所發表的演講、文章和聲明編印出來，我可以在這方面有所貢獻。因爲他們認爲這些著作反映了歷年以來的革命潮流，反映了人民力量的消長，反映了人民的力量最後衝破一切，取得勝利。本集所收集

的就是我在參加中國解放鬥爭中所講所寫的一部分。

在這裏收集的只是一部分，因爲把全部彙編起來是不可能的。有些稿子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寇進犯九龍香港的時候，在我從九龍避難重慶的途中遺失了。因此，臨到要爲這本文集搜集資料的時候，除了上海解放後所發表的幾篇文章外，我所能選用的基本資料爲數很少。我對於所遺失的資料雖已進行了搜尋工作，但是所得也不多。因此，這本書只能包括一部分寫作。

讀者們可以看出，從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四九年五月這段時期，我所發表的文字許多是以外國讀者爲對象的。其中有一部分是訪問蘇聯時發表的：一方面對於蘇聯人民給予中國革命羣衆的鼓舞和幫助表示感激，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堅持鬥爭直到全部勝利爲止的決心。其餘的部分主要是在中國通過英文報紙和其他國內外可資利用的媒介寫給英美人民的。當然，使這兩大人民了解中國的形勢，並且了解這裏的鬥爭如何影響着他們自己爭取安全和幸福的鬥爭，始終是而且在今天也還是非常重要的。至於我當時爲什麼身在自己的國家，却使用上述的方式，那是另有一個重要的原因的。由於我站在中國人民一方面，因此我向廣大羣衆說話的一切途徑都被封閉起來了。出版和廣播都完全操縱在反動派的手裏。他們不是壓制我的言論就是歪曲和曲解我的意思。

雖然有些中文出版物有時也能利用，而在必要的時候或環境許可的時候，我也利用它們，但是當我的意見必須傳播得越廣越好的時候，我就只好依仗外國報刊和其他外國媒介了。我這種辦法有時使得當時被控制的出版界不得不登載我的聲明。而這種公開的傳播方式有時也使得人民能够通過

自己的途徑而聽到。

這裏，我要說明一下，外國刊物和通訊社刊登我的聲明這一事實，並不表示它們完全同情中國革命，或者能夠讓我暢所欲言。固然，有些外國報刊的確是本着真正國際主義的精神把我們之間的合作當作共同鬥爭中的一部分。但是，大多數的外國報刊却都是帝國主義的代言人，因此它們有時拒絕刊載我的文字，有時即使刊載了，也只是爲了他們自己的目的，或是爲了要有「聳動性」，或是爲了「捷足先得的消息」。

此外我可以表達自己的僅有的媒介（尤其是在三十年代的中期），便是通過中國人民的國際友人在中國所辦的英文刊物。這些友人冒了和中國同志一樣的革命危險。我對於他們在這段最困苦危險時期中的貢獻，是永遠衷心感激的。

今天，人民取得了政權，形勢完全改變了。凡是站在革命立場上願意和人民發出一致呼聲的人，都可以採用最普及的工具，用我們自己的語言和其他各種語言來發表意見。今天，真理可以毫不受限制地達到羣衆的耳目。我是抱着這種思想來準備這個文集的，同時我希望它能够對於研究這一期中國人民鬥爭的人有所幫助。

就在我整理這些文稿的時候，鬥爭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那些以美國的銀行家——將軍們爲首的帝國主義侵略者，更加緊了獨霸全世界的圖謀。他們已經公然侵略別人的土地，大肆屠殺人民。他們進攻了我們的鄰人朝鮮人民，從而威脅了朝中兩國人民的勝利果實。這是我們不能置之不理的。

因此，今天我們的中國人民志願軍部隊正與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他們是最後一次反帝國主義的鬥爭的先鋒隊。爲了這個緣故，我謹以此書獻給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與和平建設的人民英雄。

宋慶齡

一九五二年六月於上海